

# 赋魅与刻写：榜样模范 作为信仰符号生产的仪式逻辑

——基于21世纪以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考察

杨惠<sup>1</sup>，戴海波<sup>1,2</sup>

(1. 淮阴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2.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发展征程中，榜样模范所彰显出的深刻道德美感及高尚人格特质成为凝聚个体意志、形塑价值信仰、维系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并在独特的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演化成为一种信仰符号。本文以21世纪以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作为观测对象，试图探究在权力体系的主导与规训之下，榜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符号被形塑与生产的独特路径，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榜样文化的承续与发扬提供理据性观照与支持。

**关键词：**榜样模范；信仰符号；话语修辞；劳模大会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5) 01-0075-08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作为“中国精神谱系”活化的榜样模范通过其所发挥的价值引领效力，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发展征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sup>[1]</sup> 在美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看来，榜样是一种温和而又深刻的力量，能够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人们的内心。榜样模范作为某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或某个群体所涌现出来的卓越或典型人物，其与当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紧密勾连在一起，呈现出时代性、流变性与动态性特质，是某一时代、某一阶级、某一群体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的缩影。列宁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灯塔”“火炬”，并认为通过榜样模范先锋带头示范作用的宣导与凸显，能够起到坚守理想、坚持方向、坚定信念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榜样模范已不仅仅是某个

具象化的群体或个人的代称，而是演化为一种蕴含国家意志、道德准则、政治信仰、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与文化形态，镌刻与渗透着每个时代最独特的文化印迹与时代特征。

在权力体系的主导之下，对于榜样模范的选树及宣扬，已抽离其生物性的属性，而升华为对于其所彰显的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准则及政治信仰的凸显与强化。比如，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独特的凝聚功能和鲜明的教化价值”<sup>[2]</sup> 的各种表彰大会，其在周期化、规范化、程式化的仪式展演中，通过对榜样模范及其所内蕴的榜样精神、榜样文化的多角度话语修辞，在对榜样模范的正能量形象不断进行赋魅的同时，亦在为权力体系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着鲜活的确证，从而为民众心中政治信仰、政治信念的形塑与固化持续性地累积着意识形态资源。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以下简称劳模大会）作为国家层面主导与规训的极具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政治认同视阈下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力提升研究”（24XWB0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泛媒化’视域下媒体深度融合的理念革新与路径选择研究”（23XWB001）。

**作者简介：**杨惠，女，副教授，博士；戴海波，男，教授，博士。

意指象征性的政治仪式，毋庸置疑地成为众多表彰大会中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仪式活动。本文将以21世纪以来所举行的劳模大会作为观测窗口，试图探究在中国独有的文化传播语境下，榜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符号被形塑与生产的独特路径，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榜样文化的承续与发扬提供理据性观照与支持。

### 一、榜样模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凝结与象征

在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尊敬和崇尚榜样模范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亦是进行社会动员最有效的隐形动力。榜样模范借由“人格魅力、品性、风格、声望、心理品质、礼仪修炼等个人内在与外在素质的综合作用”<sup>[3]</sup>所践行出的榜样道德行为，以及其所彰显出的深刻道德美感及高尚人格特质，在一定条件的推动下，转换成为促使社会成员生发崇敬心理和情感共鸣的感召力量，激发出社会成员的道德需要与信仰追求，引导其自觉遵从社会道德实践准则及政治秩序，从而成为凝聚个体意志、形塑价值信仰、维系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在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榜样模范一直是对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杰出代表、先进典型的统称。其实，这两个词古已有之。“榜样”一词最初主要是“样子”“模样”的意思，如诗句“何妨云影杂，榜样自天成”<sup>[4]</sup>。而具有“先锋”“表率”等现代意义的“榜样”则在明代开始出现，如“以为天下榜样”<sup>[5]</sup>的表述。现代语境中的“榜样”概念承续了古代“榜样”所具有的“值得学习的范式”的教化意义，并加入新的时代内涵。例如，《辞海》把“榜样”视为是具有代表性的、突出的“先进典型”。而“模范”一词本意是制造器物的模型，后引申为规则、法度之意，并逐渐具有了“值得学习或取法的榜样”之意，如《法言·学行》中所言：“师者，人之模范也。”<sup>[6]</sup>《现代汉语词典》把“模范”解释为“值得学习的、作为榜样的人”<sup>[7]</sup>。彭怀祖等学者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对“模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说，认为其是“值得公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sup>[8]</sup>，代表着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方向与发展要求，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通过分别对“榜样”“模范”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榜样模范是这样的一类人或行为主体：他们契合与彰显着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生产实践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们“是高尚的道德品格、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人生境界的综合体”<sup>[9]</sup>，能够对社会成员产生稳定、持久而又深刻的示范效用与感召力量。

因此，培养、选树、宣导一定的榜样模范人物，将主流价值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隐性地渗透、承载于榜样模范身上，成为整合国家意志、凝聚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并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榜样文化。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指出，统治阶级要巩固其合法统治的有效性，除了要依赖暴力与“国家机器”等强硬手段外，还须借助柔性的规训方式，“即让广大群众接受为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公认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sup>[10]</sup>。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通过对符合权力体系利益诉求及价值取向的先进典型进行宣扬、奖励与形塑，榜样模范的选树彰显出权力体系对于共同体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与标准，渗透着权力体系的观念意识与价值信仰。因此，榜样模范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渐凝练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与信仰符号，凝结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导向，成为国家话语与民族精神的象征，亦是权力体系达成所谓的构筑“共同志向”这一政治主旨所必须的“柔性”方式。权力体系通过将榜样模范树立为社会成员在思想、道德、信仰和行为上的标杆，借由各种途径与渠道对其行为与形象进行全方位的凸显与形塑，使榜样模范迅速得到社会成员的认知、认同与认可。在这一过程中，榜样模范无疑发挥着“聚合器”的功效，促使社会成员在模仿学习榜样模范的实践中，达成同频共振的情感张力与心理体验，并由此激发与固化他们坚持理想、坚守信念、坚定信仰的共同思想意识，散在化、异质化、碎片化的个体意志被重新聚合、凝结、升华为共同的国家意志，并得到个体由内而外自发、自愿、自觉地肯认与遵从。比如，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就是通过树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太行新愚公”李保国、“英雄机长”刘长健、“大湖鸿雁”唐真亚、“中国好弟弟”吴建智等榜样模范,通过榜样模范映射与彰显出的甘于奉献、爱岗敬业、守正创新的独特品质作为强大的浸润力量,使权力体系倡导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共通的、习惯的行为模式、情感依托和价值根基”<sup>[11]</sup>。在此种柔性化的涵化模式之下,权力体系与个体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不断为权力体系的合法性统治及政治秩序的稳定累积着意识形态资源。

## 二、“人民的楷模”: 权力体系对榜样模范的修辞赋魅

“话语”(discourse)作为现代西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其最初来源于语言学。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将语言区分为语言与言语两部分,言语中的口头表达则被其称为“话语”。苏联符号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以对话理论为视角,进一步指出话语“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中”<sup>[12]</sup>。即是说,话语的表达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是话语天生具有的自我属性,任何话语都内蕴着立场取向的殊异与价值理念的冲突。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话语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符号,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事件。话语的形成、散播、转换与合并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的缠绕,离不开权力的运作与操控,其渗透与镌刻着深刻的权力印迹。政治仪式作为权力体系主导的规范化、象征化的文化实践活动,蕴含在仪式主题中的政治理念、价值关切、国家意志等需借助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询唤机制进行宣导与内化。作为国家力量象征的官方话语,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仪式中的讲话,借由周期性、规范性、同质性的话语言说实践,持续对榜样模范内蕴的主流价值进行赋魅与确证。在“内化于心,浸润于情”的修辞动员中,为榜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符号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作为一场备受瞩目的政治仪式,劳模大会每隔五年举行一次,2000年以来共举行了五次,国家领导

人江泽民、胡锦涛及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五次重要讲话。以这五次讲话内容为考察对象,笔者发现其话语修辞策略主要呈现为三种方式。

第一,在重复性话语修辞中强化劳动模范的正面形象。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国家领导人在每一次的讲话中,都会反复性地运用大量正向性词汇,以“下定义”的方式对劳动模范的形象进行清晰的勾勒与描绘。借助词频分析软件,部分高频正向性词汇出现数据统计如下。

“五次劳模表彰大会”领导人讲话高频正向性词汇数据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先进	51	0.8403
伟大	50	0.8522
创新	23	0.7605
贡献	19	0.7424
弘扬	18	0.756
光荣	17	0.7518
崇高	15	0.7428
榜样	12	0.7162
爱岗敬业	10	0.7306
楷模	8	0.6826

在上述五次领导人讲话中,对于“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江泽民(2000年)把他们定义为“杰出代表”“文明的先锋”“人民的楷模”。<sup>[13]</sup>胡锦涛(2005年)也将他们视为是一群具有“伟大劳模精神”的“国家的栋梁”,并用“立场鲜明”“勇于奉献”“开拓创新”等8个褒扬性语词对他们在岗位上所展现的主人翁风采进行着具象化诠释。习近平(2015年)将“劳模”界定为为全国人民树立“学习榜样”的“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并强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不平凡业绩“诠释了中国人民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sup>[14]</sup>。

结合表格数据及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可以发现,领导人作为权力体系的代言人,不同时代语

境下，其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一群体的界定与表述却呈现出差别一致性。通过反复性地运用“先进”“杰出”“楷模”“奉献”“爱岗敬业”等正向性词汇，以“……是……”这样的肯定判断句为话语基底，在情绪递进式的言说结构中，具象化地描摹与勾勒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鲜活的群体画像。“先进典型”的形象在周期性的权力话语修辞实践中被不断赋魅与升华，在大量煽情性排比句所营造的“排山倒海”的情感气势中逐渐凝练成为一种具有政治动员功能的象征符号。在权力话语的反复性赋魅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高大正面形象在被持续性凸显与强化的同时，其所内蕴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与国家意识也潜移默化地累积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资源，在日常化的社会实践中对民众的思想信仰与行为方式进行着隐蔽化的渗透与规训。

第二，在褒扬性话语修辞中阐发劳模精神的价值意蕴。纵观五次领导人的讲话，其形成了较为固定化的模式结构，主要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概念界定、劳模精神所彰显的价值意蕴、对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发挥的主力军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这三部分构成。其中，劳模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性资源，彰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底蕴。因此，对于劳模精神价值意蕴的当代诠释成为讲话中的核心主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奋斗史与改革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当代劳模精神。对于这一劳模精神的价值内核及意蕴，五位领导人都以褒扬性的话语、肯定性的评价做出了阐释。江泽民对劳模精神的引领作用，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sup>[13]</sup>这一表述给予了高度评价。胡锦涛以“精神动力”“宝贵财富”“精神力量”等语词对劳模精神所彰显的价值效力进行了凝练概括。习近平则将劳模精神与民族命运、国家利益、时代特征进行更为密切的勾连，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概念框定将三者进行无缝对接，对劳模精神所蕴含的价值

意蕴赋予更为深刻的解读，凸显出其“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的核心基质。从上述讲话内容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时代语境下，“民族精神”“精神动力”“精神力量”“精神财富”等褒扬性话语构成了劳模精神价值内涵的主要意义所指。领导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层面对劳模精神进行了“生动阐释”与“鲜活论证”，在权力体系周期性、反复性的话语赋值中，劳模精神无疑被赋予了积极正面的政治意涵及正当合法性，延展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外延与内涵，被升华凝练为与当代中国崛起进程遥相呼应的“中国精神”，并成功纳入到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谱系之中，将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缝对接，“赋予其深厚的理论底蕴、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sup>[15]</sup>，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改革持续深入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资源。

第三，在互文性话语修辞中潜移默化渗透意识形态导向。发表于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五次领导人讲话，其文字内容、文字字数与行文结构虽有所差异，但在主要问题的阐述上却呈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在相互借鉴、滋养、呼应、肯定的互文性话语实践中，彰显出权力体系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宣导。比如对于“人民”地位与作用的评价，江泽民将“人民”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sup>[13]</sup>。胡锦涛也着重提出：“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功勋。”<sup>[16]</sup>习近平以“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评价赋予了“人民”以更高的地位，指出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赖以存续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sup>[17]</sup>。在对“劳模精神的弘扬”这一主旨进行阐述时，江泽民以“六个努力”进行了详细论述，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将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有效勾连，指出要从树立坚定理想信念、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等六个方面来着手践行。<sup>[13]</sup>胡锦涛用“尊重”“关心”以及“三个学习”来进行精练概括，强调劳模们的“伟大情怀”“坚定信念”“优良作

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sup>[16]</sup>习近平则以“两个大力、一个引导”对如何弘扬劳模精神进行更为细致的延展与观照,强调要通过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创造性劳动理念的树立,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共识。<sup>[17]</sup>从上述话语可以发现,从“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到“学习劳模优良作风”再到“树立劳动最光荣理念”的观点的延伸与拓展,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相互借鉴、相互吸纳、相互肯定、相互强化的互文性话语实践中,是在回应与契合时代发展与民众需求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凝练而成。在这些话语延展与意义生产的背后,无不渗透着权力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政治主张,浸润着权力体系的道德考量与文化审视,借助循环往复、如约而至的政治仪式实践,以互文性话语修辞策略巧妙地将其与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取向进行深度勾连与融合,从而将权力体系意志合法化地升华为一种国家意志、国家信仰,为民众政治信仰的固基与政治权力的承续提供着持续性的意识形态资源。

### 三、“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官方媒体对榜样模范的具化刻写

作为一场象征性符号的集体表意实践活动,劳模大会选树与宣扬的榜样模范及劳模精神在周期性、程序性的仪式实践中,借助政治权力体系具有意向性的话语修辞编码而凝练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符号与精神象征。而作为隶属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官方媒体,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属性,使其政治导向与宣传主旨始终与权力体系保持着同向性。因此,其围绕劳模大会所进行的宣传报道也构成此类政治仪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着其传播旨归的有效达成。在形式生动、风格多元的新闻体裁与新闻话语的加持下,为榜样模范的可视、可亲、可触、可感赋予可能性。官方媒体对抽象化的榜样模范所进行的具化刻写无疑形成了二次赋魅效力,在与权力体系互为映照、互为强化的“双向奔赴”话语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涵养”着民众的价值取向、道德准

则与政治信仰。

以《工人日报》为例,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综合性官方报刊,在五年一次的劳模大会中,其以劳模特刊、专版等版块栏目,通过消息、社论、人物通讯、新闻特写、新闻摄影等体裁形式,全景式、多角度地对榜样模范及劳模精神进行着描摹与刻写。笔者选取2015年及2020年两次劳模大会报道内容为考察对象,对其报道类型进行了分类整理,其中消息类报道4篇、社论2篇、人物通讯11篇、深度报道8篇、新闻特写8篇、新闻评论3篇、新闻图表及图片报道6篇。纵观两次大会中呈现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可以发现《工人日报》对于榜样模范形象的塑造主要以三种叙事策略铺陈展开。

首先,在人物通讯报道中,通过对榜样模范“言”“行”的动态性细致刻画,使榜样模范的形象在文本中鲜活地“站”“立”起来。比如,在《带领工友一起“飞”——记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焊工谢元立》(2015)中,主人公谢元立认为能带领团队“飞多高”“做多大贡献”是他对自我价值的客观评估,与标题形成了遥相呼应的传播效力。在谈到未来的工作目标时,谢元立用“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来形容,希望和团队一起为“中国创造”增辉添彩,以“实现技能报国的人生理想”<sup>[18]</sup>。在《在创新与坚守中成就梦想——那些奋斗时刻的劳模身影》(2020)中,通过“冷硬的钢铁在他的电焊枪下变得顺服,或飞弧点睛,或稳如泰山,平焊、立焊、挑立焊等手法运用纯熟……”“白天登车顶、钻车底、进车厢,晚上翻图纸、查资料、琢磨原理”<sup>[19]</sup>等一系列微观化的工作场景与动作细节的刻写与描摹,将“扎根基层、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抽象化劳模形象进行着具象化的诠释与书写。在《60后、70后、80后、90后4位劳模揭秘“劳模是怎样‘炼’成的”》(2020)人物速写报道中,从神态、外貌、心理等角度结合细微化、多维度的动作与行为刻画,以大量直观化的数据为佐证,如“拼过两次命”“肺部75%的面积被侵蚀”“猫腰在电缆井里”“效率提高50%以上”“花费了8年时间”“一天3000多袋包裹扛

下来”“不超过1毫米误差”<sup>[20]</sup>等描写，凸显出四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劳模所共有的“不懈奋斗”之精神特质。摆脱了传统歌功颂德式的人物报道框架，上述人物通讯、深度报道将主题意蕴内化在了文中对于情节、细节以及场景等图式中，此种生活化的细节与情节的刻画如同显微镜，清晰地呈现出人物在特定语境下的行动，结合人物白描化、朴实化的语言修辞，在情、景交融中榜样模范“吃苦耐劳”“敬业奉献”“舍己为公”等抽象化的精神品质被建构出来，成为信仰询唤的能量之源。

其次，在新闻评论中，通过对劳模及劳模精神内涵的学理性解读与诠释，彰显出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相较于以叙述为主的人物报道，新闻评论以论说性话语为主，从文化、历史、哲学等角度去挖掘新闻表象背后真正的本质问题，使新闻本身所承载渗透的内在思想得以深化与传播，并借助文学性的修辞表达手法，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阐述编辑部及作者的观点和对事实的评价与看法，以此来导引思想、传播观念。在社论《用劳动续写光荣与梦想》（2015）中，以“2968名贡献卓越的全国先进模范人物受到表彰”这一话题为切入点，开宗明义地表达出“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是国家的重要理念”的鲜明观点。全文以“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模范是亿万劳动者的杰出代表”“没有劳动创造，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的明天”<sup>[21]</sup>作为三个核心论点来深入分析与解读“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价值意蕴。在论述过程中，又进一步结合“‘蛟龙’潜海刷新中国深度”“‘嫦娥’飞天标注中国高度”“经济总量首次突破60万亿元”<sup>[21]</sup>等直观化符号对上述观点进行着确证与回应，并通过“让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价值导向”<sup>[21]</sup>等观点的凝练，在反复性的言说实践中隐蔽性地对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进行着升华与观照。社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2020）开篇就旗帜鲜明地对劳动的价值进行了诠释与解读，通过“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实现宏伟蓝图，归根到底要靠劳动

创造”<sup>[22]</sup>等观点的提炼赋予对劳动价值认同、对先进榜样尊崇的合法正当性，并将劳模及劳模精神用“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sup>[22]</sup>四个褒扬性语词进行深度凝练与概括。在此基础上，又围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论点结合客观化的事实依据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sup>[22]</sup>这些主流价值观念进行着逻辑化的论证与深化。上述新闻评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叙事策略，在归纳、推理、演绎的话语修辞中高屋建瓴，劳模及劳模精神的内涵及价值意蕴在不断被延展与丰富的同时，亦合理性、合法性地被纳入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谱系之中。

最后，在新闻图片中，通过可视化图像与数据的呈现，在视觉化的语言表征中强化榜样模范正能量群像的感染力。作为一种兼具能指与所指的视觉符号综合体，视觉主体、拍摄角度、画面景别、色调组合等构成了图片进行意义生产与意义传达的“能指”元素，在依循某种“规则”的话语逻辑之下，巧妙地将画面内容与符号的内在意义勾连在一起，潜移默化地达成“所指”意涵与传播意旨，在遮蔽与放大的双重同构中以强调某些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制造某种观看的认同。此次报道中，新闻图片主要包含摄影图片与图表两类。摄影图片以抓拍的形式，将镜头聚焦于动态性的表彰大会现场，通过俯拍、仰拍、平视、特写、近景等多元化的视觉修辞，将劳模们的形象进行着多角度的刻画与描摹。比如，由13张图片所构成的组图《时代楷模 星光闪耀》（2015）中，运用全景、远景、特写等多角度的视觉叙事，在多元化视觉符码的赋能下，不断深化与呼应着“星光闪耀”这一主题意蕴。组图《劳动者的幸福荣光》（2020）则将视点聚焦于身处于天安门广场、记者见面会、人民大会堂内、大巴车上等不同空间场域下的劳模们，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碎片化的行为动态捕捉，勾勒出劳模们朴实、亲切的具化形象。迥异于动态性的视象图片展演，新闻图表则以具象化的数字结合网感化的漫画元

素对劳模大会的相关背景资料进行着直观化的呈现。如《一图解读劳模结构》(2015)以柱状图的形式对此次被表彰的2968名人员的职业、年龄、性别、学历等分布情况进行着全景化的展示。《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回顾》(2020)则以详实的数据结合轨迹图的演示,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到2015年劳模表彰大会历史名称的演进及历届获表彰个体及群体的数字进行了清晰的勾勒。从1950年的“464人”、1979年的“340人”到2015年的“2968人”,这一系列客观字符的递进与嬗变,在直观地阐明榜样模范群体在持续壮大的同时,亦在为榜样模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符号而被凝练升华为国家话语力量提供着鲜活的轨迹印证。上述新闻图片,无论是以劳模为视觉主体的图片,还是以数据为视觉中心的图表,其借助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话语表意机制,使隐藏在媒介话语中的主流价值与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层面看起来客观公正,理所当然”<sup>[23]</sup>,从而使得积极正面的劳模形象及其所内蕴的精神价值,在权力话语及媒介话语的双重加持之下被进一步凸显与固化,不断为政治信仰的询唤累积着巨大的感召力量。

#### 四、结语

无论是古代社会抑或是现代国家,通过对符合权力体系利益需求及价值取向的先进典型、榜样模范进行表彰、奖励与弘扬,彰显出权力体系对于共同体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与标准,渗透着权力体系的观念意识与价值信仰。因此,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榜样模范凝练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与信仰符号,凝结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导向,成为有效连接宏观权力与微观个体的中介桥梁。其不仅是当代国人认知中国、理解中国、融入中国的独特文化符号,亦成为当下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政治信仰的固基中发挥着“向心力”“助推器”的潜隐式动员效力。而承载着独特政治意蕴的各种表彰仪式活动无疑成为榜样文化感召的优先场域,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明确强调,要“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

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sup>[24]</sup>。在此类政治仪式中,通过权力体系的周期性话语赋魅,榜样模范正面形象在被持续性凸显与强化的同时,其所内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与国家意识也潜移默化地累积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资源,在日常化的社会实践中对民众的思想信仰与行为方式进行着隐蔽化的渗透与规训。而官方媒体在多元化的形象刻写中,与权力体系话语形成了互为映证、互为吸纳的“复魅”效力,在具象化、直观化、可视化的叙事逻辑架构中,将微观的个体经验、价值取向巧妙纳入到宏观的国家意识形态谱系中,赋予国家权力与政治合法性话语日常化、生活化意涵,以达成对既有的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进行强化与巩固的“涵化”目的。

榜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符号的生产实践其实质是一个由权力体系主导的,旨在为青年群体建构“阐释框架”的过程。从交往实践视角来审视的话,作为受众端的“Z世代”青年们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并非一味是被动的接受者、受施方。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强调的,在内容的生产端上,虽然权力体系可以凭借其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优势对符号进行意向性编码,但在符号的消费端上却存在霸权式、协商式与对抗式三种解码方式。基于此,有着独立自主性的当代青年受众对于作为精神象征和信仰符号的榜样模范,未必能生发权力体系所希冀的认同、尊崇心理,甚或出现冷漠、歪曲、解构的异化心理。尤其是短视频时代海量碎片化信息所形构的众声喧哗场域,置身其中的青年群体在多元化思潮的裹挟下更易加剧其拒斥心理。此外,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他们呈现出鲜明的媒介性格特征及文化情感认知,“更加重视虚拟情感和文化元素带来的体验,追求深层审美与泛化审美的结合”<sup>[25]</sup>。因此,如何因应与契合短视频时代“Z世代”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与文化表达、科学合理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思想框架,并与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进程相呼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榜样模范在青年群体中的价值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进程中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定，把准方向、摸准脉搏”“牢牢把广大青年团结和凝聚到党的周围，坚定理想信念。”<sup>[26]</sup>青年群体作为新媒体平台最庞大、最忠诚的用户群，无论是权力体系还是官方媒体都应深刻把握与洞察他们的媒介接触特点与使用习惯，以新媒体技术作为引擎抓手，不断丰富创新榜样文化宣扬的仪式展演模式，以平等的“双向对话”取代单一的“宣传说教”，在与青年群体同频共振的情感双向奔赴中搭建起游戏化、沉浸化、互动化的传播场域，方能实现榜样模范的强势“破圈”。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9.
- [2] 张智，马琳. 仪式礼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J]. 思想教育研究，2019（4）：118-122.
- [3] 刘文江. 非权力领导艺术[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30.
- [4] [宋]张镒. 南湖集附[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4.
- [5] [明]李贽. 焚书·续焚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90：362.
- [6] [汉]扬雄. 法言·学行[M]. 北京：中华书局，2012：235.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00.
- [8] 彭怀祖等. 榜样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8.
- [9] 庞申伟. 榜样文化及其当代建设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7.
- [10] 陈翠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中国解读[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0）：100-106.
- [11] 刘铁芳. 生命与教化[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38.
- [12] 赵一凡. 话语理论的诞生[J]. 读书，1993（8）：109-117.
- [13] 江泽民.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0-05-01（02）.
- [14]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11-25（02）.
- [15] 刘佳. 论劳模精神的政治逻辑[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2-28.
- [16] 胡锦涛. 在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5-05-01（02）.
- [17]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4-28（02）.
- [18] 柳姗姗等. 带领工友一起“飞”——记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焊工谢元立[N]. 工人日报，2015-04-28（01）.
- [19] 李丹青等. 在创新与坚守中成就梦想——那些奋斗时刻的劳模身影[N]. 工人日报，2020-11-24（06）.
- [20] 王维砚. 60后、70后、80后、90后4位劳模揭秘“劳模是怎样‘炼’成的”[N]. 工人日报，2020-11-24（05）.
- [21] 人民日报社论部. 用劳动续写光荣与梦想[N]. 工人日报，2015-04-28（01）.
- [22] 人民日报社论部.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N]. 工人日报，2020-11-24（01）.
- [23] 吴学琴. 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16-123.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5] 李厚锐. 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家传播[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9）：53-62.
- [26] 人民日报. 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N]. 2021-05-04（01）.

[责任编辑：高辛凡]